

档案 守护人类历史记忆

引言——

档案,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它是记载人们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细数之下,被称为“世界上最早档案”的拉格什铭文距今已有五千年之久。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用各种档案方式守护着历史记忆。

结绳记事：早期人类的档案形式

上古无文字,结绳以记事。奇普便是古代印加人的一种结绳记事的方法,用来计数或者记录历史,它由许多颜色的绳结编成。这种结绳记事方法已经失传,目前还没有人能够了解其全部含义。

在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同样详细记述了印第安人的结绳记事方法,记事的绳子是由紫色和白色贝珠的珠绳组成的珠带上的条条,或由各种色彩的贝珠组成的带子上的条条,其意义在于一定的珠串与一定的事实相联系,从而把各种事件排成系列,并使人准确记忆。这些贝珠条和贝珠带是易洛魁人唯一的文件,但是需要有经过训练的“译者”,才能从贝珠带上的珠串和图形中把记在带子上的各种记录解释出来。

公元前3500年,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象形文字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乌鲁克(今伊拉克附近),这便是后来楔形文字的起源。随着文字的出现,人们开始在各种易于保存的物品上留下文字来记录所发生的事情。在基什城址附近的奥海米尔岗,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小块石板,其两面以直线刻画出表示各种事物的图画符号,其中可以辨识的有人的头、手、脚和线形符号等,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

从1877年到1933年,法国考古队对吉尔苏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共获得5万多块楔形文字泥板,这些文字是由当时的书吏使用削尖的芦苇秆或木棒在软泥板上刻写而成的,软泥板经过日晒或火烤后变得坚硬,不易变形,这些刻有拉格什铭文的泥板,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档案。正是这些泥板档案,使得后人知晓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350年之间完整的拉格什国王列表以及相关史事,也使得拉格什成为苏美尔各城邦中,人们唯一了解得较完整的城邦,为后人研究苏美尔文明提供了重要资料。

与泥板档案出现时间相近的,还有以石材为基质的石刻档案。如埃及最古老的巴勒莫石刻,记录了约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420年的法老名单及其活动,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碑记载了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颁布的法律条文,公元前522年至公元前486年在山岩上雕刻的贝希斯顿铭文等,记载了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镇压高墨达政变和人民起义并取得王位的史实。

我国收存年代最早的石刻档案是石鼓文,被誉为“石刻文字之祖”,是公元前770年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纪功石刻。后来秦始皇巡游郡县时为宣扬功德,宣示政令留下了更多的石刻,如著名的《泰山刻石》《琅邪刻石》《芝罘刻石》



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国家档案馆,是位于北京南池子大街上的皇史宬。

《碣石刻石》和《会稽刻石》等。

档案载体：从龟甲竹帛到电子网络

时代变迁,先人开始用不同的新材料作为记述载体。以中国档案材料的发展史为例,约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商代后期的占卜活动中出现了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甲骨档案,这也是我国现存历史档案中年代最久远的,出土数量达15万片以上,它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官府文书。

殷商末期及两周时期,中国古代的青铜冶铸工艺达到全盛阶段,在青铜器上铭铸字样的金文档案也随之出现。到了西周,此时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数量增多、记事广泛,具有了书史的性质。例如著名的《大盂鼎铭》,书有19行291字,记载了西周早期康王时,贵族孟因征伐西北强族鬼方有功,而受康王册命赏赐的史实。

商周时期不仅有金文档案,还有用竹片、木片作书写材料的简牍档案,主要用于一般公务文书。遗憾的是,最早出现在商周时期的竹简,经过岁月侵蚀,已经无法看清楚任何文字。能辨清的,只有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竹简。用于简牍的书写工具有笔、墨、刀,上面的文字用墨笔书写,刀的主要用途是修改错误的文字,并非用于刻字。

若若干片简编联在一起,称为“策”或者“册”。在纸发明以前,简牍是我国古代书籍的最主要形式,用于国家重大政事和书写典籍。例如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云梦秦简,详细记录了秦代施行的20多个单行法规的条款原文,为我国古代法制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学术材料。简牍档案对后世书籍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有关书籍的名词术语、书写格式及写作方法,依然承袭了简牍时期形成的传统。

我国历史上最早给档案以正式名称的是周代。当时称档案为“中”,在《周礼》上就有“治中”的记载。然而中文“档案”一词的来源,多数人认为是清代。清初文人杨宾所作的《柳边纪略》一书第三卷写道:“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多年者曰‘档案’”。很多学者便把这作为最早出现档案一词的渊源,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现,词源或许还会向更远追溯。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丝绸业的发展,王公贵族开始用缣帛作为书写材料,随之也出现了缣帛档案。缣帛作为书写材料有许多优点,可以随意裁剪,质地坚韧轻柔,便于携带和保管,多用于绘制舆图或抄写经典,缺点是价格昂贵,无法普及

使用。随着纸张的广泛应用,缣帛的使用量锐减,但是之后王朝的一些重要文书仍用丝织品书写,例如在清代,朝廷颁授文武官员的诰命等封赠文书还在使用缣帛。

另一种特殊的档案类型是司法档案,即记录民事、刑事、行政等诉讼案件的档案材料,是研究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民俗学等的第一手材料,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清代大库内閣档案、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清代巴县诉讼档案、龙泉司法档案等。

龙泉青瓷、龙泉宝剑和龙泉档案并称为“龙泉三宝”。龙泉司法档案现保存于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共计17333卷宗,88万余页,时间自1851年至1949年,横跨近百年历史,记录的诉讼案件超过2万宗,是目前所知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地方司法档案,已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每一种新的司法档案公布,都会引起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高度关注,对于学者来说,这批档案记录了清代的法律诉讼制度向近现代转变的过程,对于现在的基层治理和法治建设有着借鉴意义。

某一份档案的留存和发现,相较于人类文明的保存来说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当一件件重要的历史档案消失时,绝对是全人类的损失。1992年8月25日,位于萨拉热窝的波黑国家图书馆遭到炮火摧毁,这一事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世界记忆项目的催化器。眼见内战使得珍贵的文献遗产毁于废墟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强烈地意识到,保护文献遗产犹如保护人类记忆般重要,因此他竭力推动项目的发展,并为项目定名为“世界记忆项目”。那些符合世界意义、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确认而纳入的文献遗产项目将载入《世界记忆名录》之中。这份名录分为世界、地区和国家三级,申报文献遗产根据其地域影响力,分别列入不同级别的名录。截至2017年,我国有13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像耳熟能详的清代内閣秘本档、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甲骨文等都位列其中。

随着档案管理机构、制度、法律的完善,档案早已摆脱单纯收集原始记录的作用,已在民族身份认同、集体记忆建构以及信息资源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相信随着人们对档案认识的日益深入,人类过去的辉煌会被重新发现,人类的未来将更加璀璨。

善用档案：古为今用助力人类发展

2000多年前,司马迁曾提出了档案收集的至高境界——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以达到最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创作目的。因此,对于档案管理机构 and 档案人来说,接收、征集、管理档案固然重要,充分开展档案利用也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整整齐齐的金匱龙柜与冷冰冰的铁皮石头没有区别。

病历档案是一种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档案材料。一直以来,北京协和医院以保存病案历史最悠久、保存数量最大、名人病案最多而享誉海内外。病历、教授、图书馆并称为“协和三宝”。自1921年建院至今,医院共完整保存病案近400万份,我国现代病案管理以协和病案室的创建为开端。协和医院的病案室述工整、记录翔实、书写规范,既是鲜活的教材,又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医学典藏,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孙中山、宋庆龄、张学良

等多位历史名人的看病记录,还可以了解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等名医的成长历程,许多中国乃至世界首例的疑难和罕见病案,也记录在协和病历档案里。在这些原始病案的助力之下,协和医院对疑难重症的诊治能力享誉全国。

一种特殊的档案类型是司法档案,即记录民事、刑事、行政等诉讼案件的档案材料,是研究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民俗学等的第一手材料,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清代大库内閣档案、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清代巴县诉讼档案、龙泉司法档案等。

龙泉青瓷、龙泉宝剑和龙泉档案并称为“龙泉三宝”。龙泉司法档案现保存于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共计17333卷宗,88万余页,时间自1851年至1949年,横跨近百年历史,记录的诉讼案件超过2万宗,是目前所知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地方司法档案,已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每一种新的司法档案公布,都会引起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高度关注,对于学者来说,这批档案记录了清代的法律诉讼制度向近现代转变的过程,对于现在的基层治理和法治建设有着借鉴意义。

某一份档案的留存和发现,相较于人类文明的保存来说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当一件件重要的历史档案消失时,绝对是全人类的损失。1992年8月25日,位于萨拉热窝的波黑国家图书馆遭到炮火摧毁,这一事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世界记忆项目的催化器。眼见内战使得珍贵的文献遗产毁于废墟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强烈地意识到,保护文献遗产犹如保护人类记忆般重要,因此他竭力推动项目的发展,并为项目定名为“世界记忆项目”。那些符合世界意义、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确认而纳入的文献遗产项目将载入《世界记忆名录》之中。这份名录分为世界、地区和国家三级,申报文献遗产根据其地域影响力,分别列入不同级别的名录。截至2017年,我国有13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像耳熟能详的清代内閣秘本档、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甲骨文等都位列其中。

随着档案管理机构、制度、法律的完善,档案早已摆脱单纯收集原始记录的作用,已在民族身份认同、集体记忆建构以及信息资源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相信随着人们对档案认识的日益深入,人类过去的辉煌会被重新发现,人类的未来将更加璀璨。

追古溯源：最大的古代国家档案馆皇史宬

皇史宬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两年后竣工。它是仿照汉代“石室金匱”修建的,整个大殿没有一梁一柱,全部是砖石仿木结构,所以叫做“石室”。墙身足有五六米厚,台基高达两米,具有防火、保温、防潮、防虫鼠的功能。

皇史宬主殿内修筑了雕有海水游龙图案,高达1.42米的汉白玉石台,在台上放置着152个鎏金雕龙的铜皮樟木柜,这就是“金匱”。明清两代皇室大量的重要档案,如明代的“实录”“宝训”、清代的“实录”“圣训”以及包括诏书、诰命、敕命、题本、奏折、谕旨、廷寄、科举试卷在内的官延文书等,都珍藏于这些柜里。

如今,皇史宬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直接管辖,所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叫做“皇史宬”。

(摘自《北京日报》文/秦鹏博)

“千秋诗史杜,独立自苍苔。”9月14日,以一代诗圣为题材的历史大戏《杜甫》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都剧场开启新一轮排练,并将于9月23日与观众见面,跨国庆假期共演出15场,满足节日期间的文化消费需求。

《杜甫》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2019年创排首演的一部原创剧目,系编剧郭启宏继《李白》《知己》等作品之后,再次被搬上舞台的一部聚焦诗人命运的剧作。作品选取杜甫从“安史之乱”发生后直至去世这一段充满坎坷的人生轨迹,通过其波澜起伏的人生境遇展现诗人伟大精神世界。

一部描写文人的作品,如何让它在舞台上讲故事的同时更有文化内涵,还要兼具可看性,《杜甫》为此做出了多种尝试。作为该剧导演兼主演,冯远征表示,该剧既有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浪漫写意,让人仿佛置身于诗歌的世界,也有如第六幕“梦中梦”等层层空间之下,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

为了完成好新一轮演出,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导演提前一个月就召集剧组集中排练。“排练不是恢复,而是要重新去挖掘人物,重新去理解人物。”冯远征说。虽然之前已经有两轮演出经验,但重新排练后,剧组仍然拿出时间进行剧本围读,一字一句精雕细琢,细抠台词。因为剧中对白并不是生活化的语言,而是带有半文言性质,如何让演员说得清楚、明白,让观众能够入耳、理解,十分考验功力。排练现场,既有观众熟悉的老演员,也有不少全新面孔。他们是一批刚进入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此次将在《杜甫》一剧中首度亮相。“通过参与这次演出,青年演员能看到北京人艺是如何创作的,这将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冯远征说,“我这一代就是由老演员带着,在舞台上摸爬滚打过来的,现在要带着年轻人,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成长。这是北京人艺‘传帮带’的传统。”

近日,冯远征已被正式任命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70年建院历史上的第五任院长,也是北京人艺有史以来第一位演员出身的院长。提及这个新身份,他表示这是一份责任大于职位的工作:“如何让北京人艺的优秀传统传承下去,把艺术风格保持下去,同时还要有创新,让人艺走进一个新的时期,是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努力去做的事。”(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文/郑娜)

书店记忆

“书”,简单的一个字,却代表着一个用文字记录的多彩世界。你可以在书里尽情地探索,关于生活,关于科学,关于历史,甚至是超乎现实、天马行空的想象。书的世界包罗万象,无论是谁,只要打开书本,都能从中受益。

从小学开始,我的父母就十分鼓励我读书。对于我购书的需求,父亲一向都会慷慨解囊。记得有一次,父亲指名让我买回一本《鲁迅杂文选》。我认真读后,不禁震撼于文章蕴含的力量。同样的方块汉字在鲁迅先生的笔下,是那么直击人心。这让我对文字、对书的魅力,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将工作之外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读书之中,并且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长久坚持。在他看来,人读书就能明白道理,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困惑与矛盾。书籍无疑给了他勇气和力量。人的生活不可能事事顺意,但一旦沉浸在书的世界中,漂泊和疲惫的心就有了归属。

在我上高中时,放学的路上总会经过一家二手书店,书店的招牌已经旧得发白。店主是一个戴着眼镜、身材瘦削的中年男人。书店位于一条小巷中,周围都是些饭馆,很少有人能找到这里来买书。饭馆顾客盈门时,书店店主却气定神闲地坐在冷清的小店中,捧着一本发黄的旧书,读得津津有味。我每次路过都会有意观察店主,一段时日下来,发现他虽然每天读书

精雕细琢,『杜甫』再登台

的地点有所不同——有时坐在店里,有时坐在门口,有时斜靠在书架上——但读书时专注的神态始终如一。我甚至怀疑他开这家店,就是为了方便自己随时读书。至于生意兴隆与否,对他来说倒是次要的。

一日午后,我终于忍不住踏进了店里。店主一如既往地醉心于读书,并没有发现我闯入了这片小小的天地。我没有出声惊扰他,拿起一本旧书也开始读了起来。此刻,四周一片安静,只有我们二人时而交错时而重叠的翻页声。直到天色渐暗,店主才从书中抬起头,继而发现了我。之后,我的心情只能用“受宠若惊”来形容;或许是因为太久没有顾客光顾,店主热情非常,当即拿出许多他收藏的绝版书与我分享。当他讲起自己读书和藏书的故事,整个人都变得神采奕奕,充满了活力,连身上那些有些褪色的旧衬衫都仿佛绽放出鲜活的色彩。在他的感染下,我买下了几本书,加起来不过几十元。我问店主:“能赚到钱吗?”店主笑着一挥手:“不为赚钱。”我想,对于一位热爱读书的人来说,精神财富的价值一定远远超出了物质。

从现在开始,每天坚持读书,一定能收获一个崭新的自己——人生需要智慧,需要美,需要乐观洒脱与豪情壮志。而这,恰是读书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馈赠。

(摘自《人民日报》文/何心雨)



电影经典搬上舞台,《英雄儿女》和上海的渊源深厚



电影《英雄儿女》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64年摄制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这部电影,也成为几代中国人的记忆。影片中,英雄人物王成向世界喊出了中国军人的最强音:“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主题曲《英雄赞歌》更是感染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在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创作的大型话剧《英雄儿女》,将于10月6日至1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正式上演。这是这部经典电影首次搬上话剧舞台。从小说到电影,从银幕到舞台,这是《英雄儿女》时隔半个多世纪的一次时空对话,是对抗美援朝精神的弘扬,也是为上海这座英雄城市和英雄人民再次唱响的“英雄赞歌”。“上海——英雄城市”是话剧《英雄儿女》的主题。在这背后,是上海这座英雄城市和《英雄儿女》这部作品之间极为深厚的渊源。

巴金两赴朝鲜写成小说《团圆》 夏衍力推电影《英雄儿女》拍摄

《英雄儿女》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圆》,而当年推动电影投拍的中国左翼电影开拓者,也是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夏衍,以及影片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和主要演员,都来自上海。

“话剧《英雄儿女》以‘上海——英雄城市’为主题,是因为红色基因和英雄气质,流淌在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人民的

血脉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张惠庆表示,此次上话能够创作话剧《英雄儿女》,恰逢其时,也感到非常荣幸。

她同时提到,夏衍先生还是上话前身之一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第一任院长。上海人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1年左翼戏剧联盟,也曾以救亡演剧队、抗剧二队、演剧九队等参与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可见,上话的历史变迁、成长发展过程中也是不乏红色文化积淀的。

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上海提出“要人人有,要钱有钱,要物资有物资,要有什么有什么”,1.8万多名上海青年参加志愿军,其中1683人牺牲在朝鲜。与240多万志愿军战士一道奔赴朝鲜战场的还有来自上海的800多名医护人员、1200多名司机、4300多名铁路工人。在1951年6月至1952年5月的一年时间里,上海捐献款项达8491亿余元,折合战斗机566架,占全国总捐献飞机数量的15.3%。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军用物资被源源不断送往朝鲜前线。

在这其中,上海文艺界也深入参与其中,前后有200多名文艺工作者赴朝参加各种形式的慰问和演出。上海越剧演员徐玉兰、王文娟,为了赴朝鲜演出,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带领玉兰剧团的同志集体参军;作家巴金、靳以、王西彦等都去了朝鲜战地慰问,创作了许多讴歌志愿军的通讯、散文作品。

小说《团圆》正是巴金1952年和

1953年两次去往朝鲜战场,在战壕里和志愿军指战员同甘共苦实地采访之后创作而成。回国后,巴金将采访到的资料与切身体验整理吸收,经过若干年的积淀后,在1961年撰成《团圆》这部小说。在小说中,巴金以一位旁观者即“我”的视角来叙述,再现了他当年在朝鲜采访时的情形。这部作品因此也可以说是巴金用生命写就。

《团圆》一经发布便引起巨大反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阅读后决定让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成电影,经过数月讨论与改编,《团圆》由小说改编为剧本,并改名为《英雄儿女》。3年后,《英雄儿女》正式上映,轰动全国。

从小说电影到搬上舞台 话剧拥有60%的新创内容

《英雄儿女》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而剧中人物大多都有历史原型。整个故事都围绕上海籍志愿军战士王成、王芳兄妹相继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保家卫国展开。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作为文艺团女兵的妹妹王芳化悲痛为力量,在师政委王文清的帮助下坚持战斗。最终,王芳和养父王复标、生父王文清在战场上重逢和团圆。

如何把这么经典并且深入人心的电影搬上话剧舞台,这是留给编剧喻荣军和导演胡宗琪的课题。

“巴金的小说非常的扎实,然后也很

感人。而电影更是影响了我们几代人。”喻荣军也是从小看《英雄儿女》,影片中很多经典的场面,以及那首歌,在他心中一直留下深刻印记。而在对这次创作进行梳理的时候,导演问了他将近80个问题,都是关于剧中四个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以及剧中人物和现在观众之间的这种联系,这也打开了他更多的思路。

为了完成这一次的话剧创作,喻荣军先后采访了很多在上海的志愿军老战士,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真实的细节让他深受震撼,“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特别能感染我自己。比如有看到当年战士们签的生死协议书,那个瞬间感到巨大的震撼。这也给了我非常多的创作冲动。”

在整个采访创作过程中,很多志愿军老战士为剧组提供了很多历史细节,而这些细节都有在剧中体现。据透露,此次话剧,很多内容都将是电影中没有的,原创的东西会占60%左右,但是观众依然能从中找到那些经典的熟悉的東西。当年电影中短促的一两个镜头,可能在话剧舞台都将会拓展成一场很有情感的戏。

该剧导演胡宗琪也是军旅出身,此前,他导演的话剧《白鹿原》《黄土谣》等作品在全国引发广泛影响,这也是他继《追梦云天》《贵胄学堂》之后第三次和上话合作。在这次创作开启之初,他就和剧组分享了《英雄儿女》对他们这代人的

影响。而整个剧组演员都在排练之初进行了军训,以更好展现英雄风貌。

上海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话剧是一次精神赓续

据悉,此次话剧《英雄儿女》的创排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关心下,由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局指导,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联合出品。

在剧组的发布会上,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局副局长、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张旭伟表示,话剧《英雄儿女》弘扬的是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体现的是上海这座英雄城市的特殊品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造导向的生动实践,也是以文艺作品来讴歌英雄致敬英雄的生动体现。

张旭伟谈到,上海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平时时期,上海从来不缺英雄。而一个民族对待英雄的态度,会影响塑造着国民的世界观。”我们当下的时代硝烟散尽,承平太久,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从哪里来。所以更加需要我们这种英雄的精神,营造致敬英雄的浓厚氛围。

“如果说现在能够创作出一部新的《英雄儿女》,跨越时空对话,弘扬精神赓续,那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来源:澎湃新闻 文/潘妤)